◆观 点

# 信息公开要让人明白

交通部去年底发布的《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显示，全国收费公路收支平衡结果为负661亿元，即整体亏损661亿元。

这个数字让人很吃惊，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明。巨额亏损，是因为欠贷高，还是经营管理不善？从公布的信息看，不清楚。661亿元是个笼统数据，怎么算的，成本机制如何，需要一笔经济账。信息不充分，“整体亏损661亿元”就是个匆忙的结论，值得推敲。

政府部门公开信息，为的是答疑释惑，满足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求知欲”。信息充分，才能解释清楚问题。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建立信息发布机制，时至今日，政务公开渐成常态了，但信息不充分的问题仍然存在。

信息看上去是客观的，譬如数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信息量不同，采集方式不同，结论就会很主观，譬如有交通部相关人士解释，“银行贷款年限与公路收费期限不一致，导致每年的还本金额高于收费公路按收费年限来算的成本”——这是一家之言，但不排除计算方式存在疑点的可能性。公布收支平衡结果，为的是满足人们对公路实际运营状况的知情需求，即便亏损661亿元，这个数据却没有说明经营状况怎么样，猜测的空间太大。

信息公开，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以前，政府只要信息公开了，就被视作政治进步。这种进步，更多在价值层面，带有象征性，往往被理解为现代政府姿态，公开就是进步。信息公开制度发展到今天，8个年头过去了，不再是零起步的状态，政府部门都在公开，但提供多少有用、准确的信息，公众在重新评价，心中的标准更加严格，难以对付了事。

有时候，提供了一些信息，算是抛砖引玉，人们有了线索，可以提出疑问，可以申请其他的公开项目，直至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有时候，政府部门就成了“媒体”，努力让人们更方便、更清楚、更准确地理解一道信息，避免误解、混淆视听，而这需要更多地责任和付出。如今，公开信息不是完成例行发布仪式，公共治理有越来越多繁杂的问题，让人们知道得越多越全面，政府部门反而落得轻松。

由近年来推动包括“三公”经费在内的信息公开的历程来看，由于直接触动利益，要让相关职能部门真正做到有“诚意”、负责任的信息公开，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不仅讳莫如深、秘而不宣的领域少了，但一些时候，公开数据还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总算公布出来了，或是只有结果没有算法、说明，或是看不清楚，搞不明白。

信息公开是政府接受监督、提高行政效能的必要前提，随着现代政治理念的深入人心，及时、准确的信息公开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义务。如果信息不能消除、澄清公众疑虑，就会引起更大的质疑，对于政府公信，没有加分，与公开的目标就背道而驰。（2015年3月20日《长江日报》李杏）

# 让职责成为权力的“负担”

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进行公开权力清单的探索和试点，取得了积极的经验和效果。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探索、试点的基础上，在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度简政放权的改革语境下，对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进行了全面部署，这对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正确认识和切实推进权力清单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权力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存在。在传统体制格局下，权力首先承载或隐含着具体的利益，这些利益有的可以通过合法行使权力而实现，有的可以通过权力延伸、权力滥用、权力寻租等方式得以实现。许多权力部门天然存在着争取权力、垄断权力、扩张权力的冲动，总是希望自己手中的权力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以为只要权力越多越大，能够掌握的资源和谋取的利益也就越多越大。近年来，政府转变职能，缩减行政审批事项，实行简政放权，这些改革之所以面临巨大的阻力，主要原因就在于要触动一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奶酪”，无异于要割他们的“肉”，革他们的“命”，他们当然要采取各种方式予以抵制或反对。

当前，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对权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与权力直接联系的首先不是权力部门的利益，而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权力部门被赋予了一定的权力，意味着他们必须履行相应的职责，如果未能尽职尽责，或因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权力部门和有关人员就要被追究责任，包括对触犯刑律者追究刑事责任。从逻辑上说，这将使权力部门和公务人员完成一个重大的观念转变——从以往首先将权力与利益挂钩，把权力当成一种“享受”，所以希望权力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转变为首先将权力与责任挂钩，把权力当成一种“负担”，在行使权力的欲望与承担责任的能力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清理行政职能，公开权力清单，正有助于促使权力部门和公务人员完成上述观念转变。当政府部门和公务人员可以行使哪些权力、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什么、行使权力需要遵循什么程序、能行使到什么程度等等内容，都在权力清单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为公众广泛知晓，行使权力的人就受到更多更严的监督约束。他们如果超出权力清单的规定使用权力，权力清单设置的“警钟”就会自动报警，负责监督监察的有关部门以及新闻媒体、公共舆论就会行动起来，对“超范围用权”者提出质疑、警示，作出问责处理。这个时候，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的确转化成为执掌权力者的沉重负担，执掌权力者既不能随意放弃行使权力，因为那样意味着放弃履责，涉嫌失职渎职，也难以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和非法利益，他们手中的权力就这样被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只能背负权力的重担奋力前行，别无他法。

权力清单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如何确定权力清单的内容，就成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关键。权力清单以列举的形式，明确规定政府部门可以行使哪些权力，在清单之外，政府部门没有任何权力，正因为权力项目如此“敏感”，清单上到底应当列举哪些权力项目，就不能由政府部门自己说了算。

各级人大首先应当正式参与进来，和政府部门一道清理、调整行政职权，依法制定权力清单，全面公开权力清单。其次，制定权力清单还要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充分吸纳公众参与的热情和智慧，确保列入清单的权力项目不得危害公共利益，不得侵犯公民权利。只有这样，权力才能真正成为执掌权力者的“负担”，权力清单制度才能真正成为加强对权力监督制约、推动政府自身改革的利器。（2015年3月26日《北京青年报》镝镝）

◆纵 横

# 新加坡的“禁令”为何能行之有效

不少人感叹新加坡城市整洁、有秩序，没有人乱丢垃圾，也没有人清早起来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吃猪肉大葱馅的包子。

很多人会说，新加坡人素质高，从小接受了良好的环境卫生的教育。但你也许想不到，正如北京和上海一样，新加坡是一个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大的社会。为什么这些初来乍到的外籍工人也能很好地遵守社会规则？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新加坡高额罚款的威慑作用。以新加坡的地铁为例，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禁止标志。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禁止标志都将罚款金额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而罚款的额度也是令人咋舌。比如，携带易燃物品的罚金高达5000元新币（1元新币约合5元人民币），吸烟的罚款是1000元新币，而喝饮料与吃东西最高可能被罚500元新币。

不要小看这些罚款标志，在新加坡，看到了如此高额的罚款，你的第一反应会是：“我是不是犯法了？”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加大处罚的同时，新加坡的市政建设也大大降低了人们遵守规定的成本。有统计显示，新加坡平均每5~25米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垃圾桶，这也为公众维护卫生环境提供了条件。

如此严厉的惩罚也会引起一些质疑。然而，正如所有法规一样，新加坡的禁令有其不近人情的一面，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存在的必要。

绝大多数新加坡人和外来者之所以能够认可这些禁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家都看到了这些禁令带来的好处——新加坡能成为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离不开这些禁令。更重要的是，这些禁令并不是设计者的心血来潮之作，也不是某一次运动的产物，相反，它体现出了制定者细致的设计，更有持之以恒的执行，以及系统性的规划。（2015年3月24日《东方早报》查雯）

◆评 论

# 亚投行不是中国版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宣布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后，有海外媒体提出“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已经到来，认为已经运行了71年的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将被中国倡导建立的新秩序取代。这一说法夸大其词，也不合现实。

所谓布雷顿森林时刻，指的是1944年7月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英国等44个国家代表齐聚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行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两大国际机构。加上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形成国际经济治理的三大支柱。这一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标志着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主导地位的确立。

虽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放弃美元对黄金挂钩的金本位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遭受重创，但世行、IMF和世贸组织至今依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也曾一再强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未解体，而是在不断演进。

世异时移。几十年风云变幻，全球经济现实版图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既有的经济治理体系面临的改革之需日益迫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行和IMF均着手改革，给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自我演进的例证。当然，其演进速度没有跟上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例如中国经济产出已占全球的16%，但在世行只拥有4.42%的表决权。

长期以来，中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改革者。但毋庸讳言，该体系改革的进展不令人满意。亚投行的出现正是对现有秩序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现有秩序的一种改革激励。而IMF2010年作出的旨在提高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迄今仍未实施。

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日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上发言时表示：“亚投行对世行、亚行（亚洲开发银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

如今的亚洲经济活力四射、发展潜力巨大、投资需求旺盛，任何单一机构都难以满足该地区的发展需求。因此，亚投行将和其他多边开发机构一起合作推进该地区发展。正如金立群所说，“我们相信绝不会发生互相‘踩踏’的事件”。

此外，从全球秩序的历史演化经验来看，目前讨论“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显然不合时宜。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合作、共赢、开放、包容才是时代的正脉。这也正是中国倡导创设亚投行的初衷和依据。

不可否认，倡议建立亚投行，的确是中国将自己经济发展硬实力升华为更多地区话语权软实力的尝试，中国也将逐步承担与其国力相称的更多国际责任。可以有充分理由相信，亚投行将为地区发展贡献更大力量，从而增益世界经济。（2015年3月26日《钱江晚报》金旼旼）

◆史海钩沉

# 张之洞之官品

## 为官之首要：忠正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由科举步入仕途，历任学政、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是晚清政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张之洞的一生，勤于政事，一身正气，用权不结党，用人不谋私，始终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诚勤勉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

中国作为饱受欺凌的弱国，19世纪中叶以来，对外强硬还是妥协退让已经成为不少中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分界线。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坚决主战是张之洞出自内心的选择，而义和团事件中，他坚决抵制慈禧的倒行逆施。

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张之洞以国家为重，确实做到了“不分畛域，统筹全局”，因而得到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的赞赏。中日战争中，张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机，他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我公统筹全局，谋国之忠，与人之厚，诸深钦佩！”

1907年，张之洞重病时，读白居易诗“以心感人人心归”句，悲从中来，作《读白乐天“以心感人人心归”乐府句》：“诚感人心心乃归，君臣末世自乖离。岂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诗言志，张之洞此时以诗表达对朝廷政策没有顺人心的痛心，对皇亲国戚胡作非为、倒行逆施、排挤汉人终于导致“君臣乖离”的愤懑。

张之洞强忍病痛折磨，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其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 为官之胸怀：担当

在张之洞看来，在其位，就要谋其政；身为官，就要有作为。1867年7月，张之洞奉旨充浙江乡试副主考，主持浙江乡试。

自清初以来，科场作弊大案就时有发生。张之洞上任后，一反科场旧习，严格追究敷衍者，不辞辛苦选人才。为防止弊端，他恪尽职守，“最勤于搜遗，得人甚多”。不拘于文字格式，而专以真才实学取人，使不少“不合场规文律”者脱颖而出。

张之洞所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作为传统的官僚士大夫，他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个志气过人、胆气超人、才气高人的改革者。

《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他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改革之路。为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不留余力。抓工业，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纺织四局，主持、督办修筑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抓教育，他开办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抓军事，他编练新军，建设一支以铁甲舰船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抓经济，他发行彩票、开铸银圆；抓国防，他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既有利，更有功……

这些都是“当惊世界殊”的大事和开风气之先之新事。张之洞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顺应了时代的先声，符合中国人民求强求富的抉择。

张之洞所做的这一切，用两个字来形容，就叫作“开放”。在一个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年代，张之洞全然以他个人的能量使得地处内地、经济封闭保守的武汉拥有它生平最大的一次飞跃。毛泽东在讲到中国的重工业时，曾特别提到，不能忘记张之洞。

“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是张之洞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无论是地方治理，还是大兴洋务，他敢为人先，政绩昭然，口碑在民。“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千难不惧，万险不辞，无不展示了他超凡的意志、超前的观念、超人的政绩。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为官品格中最为光彩的一笔。

## 为官之境界：善任

张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凡百政事，竭须得人”。他任用部属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才气、气节。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护才之胆，常令幕僚钦佩不已。

无论在哪个世纪，人才都是最宝贵的。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山西洋务实业，张之洞令人印制了一份题为《延访洋务人才启》的招聘启事，明确提出了他的观点：洋务为当务之急；以商务为体，兵战为用。这则启事发布后，引起了朝野上下广泛关注，各省洋务人才更是闻讯而至。

张之洞在广揽人才的初期，积累了丰富的用人经验，形成了高超的驭人之术。在用人问题上，张之洞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1880年2月，他在《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中指出，“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南船北马各用所长”。这些观点，可以说是张之洞用人实践的总结。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张之洞无疑是后者。

为政之道，任人为先；选人之道，打赢为本。1884年5月，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议，大胆起用具有军事奇才的爱国老将冯子材。

此时，冯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张之洞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勇士之风总是在最“吃紧”处担当，英雄本色总是在最“要紧”处彰显。1885年3月24年，冯子材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不仅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而且还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是19世纪中国对外战争中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以来，未有如此大胜者”，可谓“言不为过，前无先例”。

张之洞用人不拘一格，不避嫌怨，幕中收纳了一批奇才怪杰。他主张用人宜破格，提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发挥最大潜能。“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张之洞一生保荐人才300余名，其中不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

张之洞“无台无阁，无湘无淮”，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道合。时至今日，张之洞选人用人的胆识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 为官之本色：清廉

张之洞是一个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则，保持清廉，还要求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属吏的馈赠。这样，“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做到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在无官不贪、无吏不肥的晚清官场，清正廉洁的张之洞，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个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更令人敬佩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他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赠礼物”。张之洞督粤时，时逢五十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三千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溪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张之洞一生对上不行贿，对下不摊派。历任两广、湖广总督二十余年，经手的银子数千万，笔笔有交代，款款有着落，自己不取分文，虽然总有人指责和弹劾他“糜费巨款”，但指不出他有“中饱私囊”的任何事实。在即将坍塌的末世王朝，这是极为罕见的。

《清史稿》记载，张之洞“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一个人只有从内到外散发出高山仰止的迷人风范，才能穿越千古，令人仰慕。张之洞是个好官，做官当如张之洞。（2015年2月上《领导科学》蔡建军）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010）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010）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010）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